第 53 卷 第 1 期
2016 年 1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 No. 1
Jan. 2016

关于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考

约翰·罗默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

一、20 世纪的资本主义

对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分析得最好的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皮凯蒂集中于两点:一是在一个国家中总财富或者资本与年均收入的比例,二是财富或资本的集中。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1910 年国家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是 4.5∶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降到 3∶1,2010 年又升到了 4∶1,这意味着国家财富相当于 4 年的国民收入。欧洲的财富—收入比例更加不稳定。1910 年财富—收入比例是 6.5∶1,到 1950 年这个比例下降为不到 2.5∶1,到 2010 年再一次超过美国——5.5∶1。由于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现在资本一直在恢复。

国家拥有大量资本本身没有问题,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大量集中于一部分人手中。1910 年,占美国人口 1% 的最富裕的人占有全国 45% 的资本,1945 年降到 30% 的低点。自那之后有缓慢的恢复,2010 年最富裕的 1% 人口占有 33% 的资本。在欧洲,1910 年最富裕的 1% 人口占有超过 60% 的资本,1970 年降到 20% 的低点:欧洲的资产阶级经历了比美国更加尖锐的危机。之后有了缓慢的恢复,2010 年欧洲最富裕的 1% 人口占有 25% 的资本。

欧洲与美国的情况对调了。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前期,欧洲比美国的资本集中程度高,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毁灭性影响比美国严重得多。而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工会和工人的消灭更加成功,资本恢复速度也比欧洲快。然而,欧洲的资本仍是高度集中的:占人口 1% 的最富裕的家庭平均财富是普通家庭的 25 倍,在美国这个比例是 33∶1。

20 世纪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最好的时期是 1945 年—1975 年。这是资本重建的时期:劳工要求高涨,工人待遇提高很快。惮于苏联的崛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工人阶级做了许多让步。全民健康保险 1947 年在英国第一次得到实现,继而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美国 1964 年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为年迈者提供健康保险。工作时间得到缩短:德国工人平均一周以高效的生产力工作 28 个小时。福利国家在北欧国家中越发重要,国家征收了大约 50% 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只花费很少一部分用于国防费用。甚至在福利政策相对较少的美国,征收了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但将收入中的相对高的部分用于国防费用。

社会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资产阶级将社会保险看作是防止工人阶级寻求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第二,中产阶级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消灭了,这就使一大批包括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选民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诉求;第三,这些国家为表达对二战中的参战士兵的感激,将社会保险视为对他们的补偿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在美国则相对弱得多。除了 1941 年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外,在美国本土没有发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资本没有被消灭。这场战争不足以推动美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共产党员被赶出工会,失去了工作,并被抓进监狱。冷战的意识形态增加了

本文为作者提供给北京大学“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专稿,中文版的发表已征得作者的同意。译者黄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情绪,马克思主义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学生运动时期才重新受到欢迎,但也只是在学生中间而已,没有真正深入工人阶级。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累进所得税在美国十分重要。1950 年最高的边际税收是 91% ,这保持到了 1980 年。之后,在里根时代,从最高点降到 50% 之后又降到 29% 。克林顿时期增加到 39% ,保持到了今天。边际税收的急剧降低应当为近年来美国资本的集中负大部分责任。

随着资本的集中,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保留自身的财富。这个阶级的主要政治工具就是共和党。在今天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分歧非常明显,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占据选举的半壁江山。共和党已经往右翼的方向走了很远:它反对政府,反对社会保险,反对税收,反对移民,是种族主义者。然而,大约有 50% 的选民支持这个政党,包括一些工人阶级,特别是在美国南部。民主党未取得美国南部选票的主要原因是南部公民的种族主义。虽然经历过南北战争,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黑人总统的出现激怒了这个地区的选民,从而使茶党支持率上升。2012 年的选举中,70% 的拉美裔和亚裔选民,90% 的黑人选民支持民主党。但是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不相信民主党,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但是主张要对工人阶级做出适当让步使其满意。共和党则相信它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和枪支控制工人群体。

资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控制工人阶级,从而维持政权,即宣扬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胜利,苏联经济的失败增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受众群。美国资产阶级花费大量金钱和力量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资产阶级通过创造意识形态体系来控制群众的能力。例如在美国,工人阶级因为种族歧视而被分为不同阵营。枪支被用来对付工人阶级中最激进和绝望的部分——非洲裔美国人。近年来黑人抗议全国到处都在发生的城市警察谋杀非洲裔年轻人甚至儿童的斗争,是一场重要的斗争,正在赢得大众的某种支持,但这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在美国,许多白种人看着他们国家的肤色逐渐发生改变: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由白种人构成的基督教国家,但是现在它的人口中有 12.2% 黑人、16.3% 拉美人和 4.7% 亚洲人。大多数公立学校中的学生都不是白种人,一些白种人接受了这一事实,但许多人仍不接受。2012 年有 61% 的白人选民支持共和党,由于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不富裕,他们对共和党的吸引力主要是源于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选民中的工薪阶层在过去 20 年中实际收入没有增加,但他们的经济情况还没有糟糕到使他们放弃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反动的政党的支持。

相反的,欧洲的财富集中现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比美国慢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仍然保持了较高的边际税收。到 1980 年之前,英国最高的边际税率超过 90% 。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使它下降,如今英国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与美国大致相同的比值,大约 40% ,因此在过去 30 年中英国的私人财富迅速增长。相比之下,德国的最高边际税率是 60% ,法国超过 50% ,瑞典超过 70% ,因此在这些国家私人财富的积累就慢得多。

欧洲国家依然是坚实的福利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最大的压力主要是近年来政治领导人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紧缩政策。非洲和中东的移民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压力——由于种族主义,以及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都是贫穷的或者没有工作的人。然而,欧洲国家依然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一个穷人在欧洲会比在美国过得好得多。中欧和东欧越来越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包括俄罗斯在内。俄罗斯资本的集中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叶利钦时代将自苏联时期以来积累的公共资本大量地转移进一个寡头团体以获得政治支持。

总之,资本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仍然是有活力的。财富的集中程度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最富裕的少数人花费大量金钱控制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个利益集团在过去 30 年中财富飞速增长。美国人缓慢地感觉到了不平等。大约一半美国人反对平价医疗法案,反对将医疗保险扩展到全国,这足以说明这种思想上的反常程度。共和党一再强调,如果它获得权利,将废除这个法案。很少有针对金融危机的反资本主义大

规模组织。“占领运动”很重要,也曾经做过一些事来提高这种意识,但没有持续。工会成员中的工人已从 1960 年的 30% 降到如今不到 10% 。美国最有前景的劳工运动来自那些受到极端剥削的工人——那些从事快餐服务及其他卑微服务行业的人——要求每小时最低工资 15 美元,这个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比 1969 年还低。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来说不再有吸引力?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亨认为,在 19 世纪,工人是最贫穷的,受剥削最严重的,同时也是最有力量推翻资本主义机器的群体。但是今天,这三个要素不再集中于一个独立的群体中。最穷的人是没有工作的,在很多国家都是移民群体。受剥削最严重的是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人:快餐行业的工人,旅馆和医院的清洁工。而那些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通常都有体面的收入,并且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产业工人:比如电脑工程师和相关职业。所以工人阶级不再需要同情,也不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拥有力量。由于没有一个独立的集贫穷、受剥削、拥有力量于一体的群体,工人阶级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那种团结——至少在西方是这样。

而且,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实验失败了,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是个例外,从 1979 年到现在实现了经济迅速增长,使至少 3 亿人摆脱贫困。在我看来,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市场的恐惧与政治独裁。市场是一种已经被人类使用数千年的工具,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体都需要市场。如果市场能够正常运转,它就可以带来创新和价格调整,所以市场就能达到以下效果:企业有可能购买到生产需要的原料,消费者能够在杂货店货架上找到需要的物品。

市场的问题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会导致财富与收入的集中,进而导致权力的集中,正如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看到的那样。中国从 1979 年开始市场的实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创新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不平等的加剧与财富的日渐集中。对于如何设计一种市场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没有答案,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需要市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贫穷国家可以在发展成熟的市场之前通过使农民进入城市工厂工作,实行土地改革等方式实现发展,这是经济发展中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他们也可以通过复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实现发展。但为了实质性的创新,国家需要企业家。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像数百万的企业那样对当地条件有那么多想法与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对的:兰格的所谓市场根本不是市场,也不可能带来创新,因为创新需要能够真正创造和发展新产品的企业家。企业家不从事基础科学,但他们会把知识与改变带进商品中。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给了企业家创新和售卖产品的自由,那么如何控制财富流入这些成功者手中呢?一种可能性就是当这些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国家从企业家手中购买成为国有企业。为了激励这些企业家,不能实行简单的没收,应该给予这些企业家足够的补偿。所以即使他们不能成为亿万富翁,也能成为百万富翁,继而组成特权阶级。这个方法管用吗?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陈先生创新了一种产品,创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最终被收归国有,然后陈先生成为为国家管理这个企业的最好人选?当然,国家不会愚蠢到聘用还不如他的人接替他的工作。作为新企业的经理,陈先生会成为一个从国家得到相当可观的收入,不积累权力,只是简单地经营企业为国家创造财富,制造消费者喜欢的产品的人吗?

似乎很难使市场社会主义有效运转起来,除非人们具备“社会主义精神”:也就是说,除非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合作工程的一部分,他们的角色是为这个工程贡献所能,使他们自己从属于大多数人的决定。这里我们有一个来自资本主义的比较好的例子。德国企业同时由投资者(即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工人,企业所在的社区代表等)管理。根据皮凯蒂所说,这些德国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比传统的投资控股公司要低,因为由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企业不会寻求股票价值的最大化,他们有更广泛的利益和目标。但是这些是更好的企业,他们更加关注工人和消费者福利。

三、社会主义蓝图?

今天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已没有社会主义的蓝图了。在 19 世纪,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蓝图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是事实证明这不是那么简单。苏联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的成功,制造了足够的武器并在二战中成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没有苏联在东部战线的成功,西方的伤亡会更大。20 世纪 50 年代,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苏联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当时苏联经济被认为最终会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西方主要强调“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优越,而不是经济上的。但是后来苏联的经济遇到了瓶颈,而且苏联花费大量财富于军事投资,这对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而对美国来说,这样做反而创造了充分的就业。军事制造在苏联和美国造成了相反的影响。关于苏联经济最终失败的解释至今仍无定论。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央计划的失败已经很明显了,缺乏激励企业创新的机制是失败的关键。苏联从未成功引入市场机制,也许是担心无法有效控制市场,使政党权力遭到削弱。

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从 1979 年开始开放农业,并最终成功引入市场机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成就是巨大的,在 30 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 9%,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但中国没有解决在引入市场机制时维护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这是社会主义在近些年面临的巨大的挑战。缺乏“社会主义精神”的市场机制会造就贪婪和不平等。但是市场在一个大的复杂社会中又是必需的,没有市场,就没有创新。中央计划无法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有效控制资源分配的问题,但是如何使市场被引入的同时不导致财富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但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保留是必需的。没有“社会主义精神”,贪婪的人会使市场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目前,社会精神——如果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精神”——成功阻止市场造成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是北欧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依然是私有的,但是高税收制度使收入重新分配并为福利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公民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和行动保障来平衡收入。北欧国家的社会精神从何而来呢?它来自强有力的劳工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政党来代表的,它来自于征服腐败:北欧国家的政治家将他们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而不是谋取私利。“平等、体谅、合作、互助”构成了我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要实现这些精神,“公有制”是一种策略,但这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来说,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瑞典是一个小国家,在它建立福利国家时它在种族、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比较平衡。我们不知道这些因素对于造就“社会主义精神”是否必要,我认为它们不是,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强有力的历史依据。但是,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大国在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时犯的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必须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竞争时取得胜利,如果人们相信它是对于人类最好的思想意识,它就会最终胜出。使这种胜利困难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韧性:但这些想法不能被粉碎,它们必须通过论证和例子被击败,其他的都没有用。

使人类在五种类人猿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的“合作能力”。人类是类人猿中唯一会模仿的物种:这是语言的先兆,在人类中很有用,因为这些可以帮助人类捕猎,但直到人类成为能够在捕猎中合作的物种时才有用。语言最终在人类中形成是因为人类是合作性的物种,语言只有在合作性的物种中才能够能到发展。我们的大脑得到进化是因为我们具备合作的能力,合作意味着我们能够共同从事大型和复杂的工程,而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人脑通过选择性的适应就会变得更大,因为我们需要它来从事复杂的、我们的合作能力能够实现的工作,其他物种不具备这种合作能力,因而也不需要大的头脑。

合作是智人区别于其他类人猿之处,当然,我们也彼此竞争。经济理论强调竞争本质,但合作才是人独特的地方。社会主义使这种合作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社会主义精神使合作精神得以广泛传播。马克思称之为“工人阶级意识”,也就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合作中达到的,了解他们有能力通过合作制造复杂产品的意识。合作与利他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不要求我们像爱自己的亲

人和亲密的朋友那样爱每一个人。它是要让我们理解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奋斗环境中,只有合作才能够成功,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市场强调竞争,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废除它,而是要控制它。而这只有靠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才能做到,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很容易打破规则。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在没有合作精神的情况下发生的典型例子。贪婪主义极大地影响了金融产业,没有有效的规则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极其聪明的人如果足够贪婪,总能想到办法规避规则。这都归结于“社会主义精神”的消失。政府监管部门会被私有产业和金融系统收买。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精神”,才能够阻止。

我们目前还没有社会主义的蓝图,也就是说,还没有有效地在市场机制中保留“社会主义精神”的方法。我相信市场会鼓励创新,即使我们不允许企业家保留大部分财富。驱动创新,在社会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创新者,就足够了。比尔·盖茨拥有800 亿美元财富,但我相信即使他只能保有少量资产依然会致力于推动微软的创新。成功的资本家挥霍很大,但这是为了向别人展示他们的成功,而且是一种证明成功的低效方法。社会地位不需要通过建造一座拥有 1000 个房间的房子来显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如果它的领导人拥有大量财富,就不可能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这是最基本的。公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领导人会为人民服务。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与普通民众一样,法国巴黎公社领导人的工资与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一样。这是必要的,但显然还不够的,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的规则来说。

四、历史的教训

我不知道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很怀疑社会主义在美国不会通过一场大崩溃来实现——一场战争或大的经济危机。我希望我是错的,希望会有一场进步运动来缩小不平等,扩大社会保险,使美国的大部分财富用来提升大量公民的福利。但我并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回到了一种更像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那样的情形,大量私有财富通过继承传给下一代,我们将有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富人将生活在封闭的社区中,使用他们的私人飞机,也不会与除了仆人以外的普通人并肩。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面临气候变化下的全球危机。如果不限制增长,我们将造就一个只能勉强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在未来 30 年,我们有可能创造一种浓度 450ppm 的温室气体,这最终会引起全球温度提高至少 2 摄氏度,或许比那更高,从而给我们的生物圈和生存环境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必须限制排放,如果它们这样做,我相信别的国家也会这样做。我相信让中美双方在限制气体排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同意中国在人均 GDP 上赶超美国的日期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全球变暖,中国本应用——让我们说——75 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就应该经历这么长时间。没有其他协议是可行的,因为其中一方会强烈反对它。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限制发展速度,否则大量的气体就会被排放,我们将会超出地球的碳排放预算,继而有发生气候灾难的可能。我和我的合作者已经计算出为了保证美国和中国的差距时间和充分限制气体排放,全球化的北方(美国、欧洲、日本)在未来 75 年内必须保持平均每年的年增长率不超过 1%。中国也必须限制发展速度,但不用到这种程度。但是美国人不会同意将增长率降到 1%,除非出现增长的重新分配,也就是所谓的“公平增长”。这些年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增长每年大大少于 1%,因为大部分收入增长都到了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群中。这样,在美国,解决气候危机将会要求对增长果实的重新分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共和党不承认气候危机的存在,因为他们中更聪明的人意识到为了解决气候危机必须有大量国家干预,特别是在美国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因此,我认为,如果人类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危机,在美国将带来收入分配的戏剧性的变化,也许会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中国如何处理降低增长的问题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超出了我的能力预测范围,但我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能够思考解决气候危机带来的影响。

(责任编辑　刘曙光)